

## 第一章

# 口译研究的基本概念

第一章介绍与口译相关的基本概念，其中介绍的一系列口译类型和研究术语为后文章节将要进行的广泛讨论做了铺垫。



### 本章要点：

- “口译活动”的概念根源
- 口译的定义
- 口译与笔译的关系
- 口译活动发生的社会场景和互动格局
- 区分口译类型的主要参数
- 不同口译“类型”之间的复杂关系
- 口译实践与口译研究的理论维度及范畴探索

## 1.1 概念根源

本书所讨论的口译是指一种**翻译活动**，是“翻译”（Translation，使用首字母大写是为了表明这个词的含义是类属性、上义性的）的一种特殊形式。口译是人类一种古老的实践活动，显然先于书写和笔译而存在。在许多印欧语系的语言中，形容口译这一概念的词语往往独立于笔译的概念而存在。在日耳曼语、斯堪的纳维亚语以及斯拉夫语中，形容人们从事口译活动的表达方式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1900 年的阿卡德语，即亚述和巴比伦尼亚的古闪族语（参看 Vermeer 1992: 59）。阿卡德语中通过阿拉

伯语词源而来的 *targumânu/turgumânu* 一词使得英语中出现了描述译员的独立术语“拉格曼 (*dragoman*)”。

相对应的, 英语中的“译员”一词来自拉丁语 *interpretes* (意思是“详述者”“解释晦涩难懂之事的人”), 其语义来源尚不清楚。一些学者取 *interpreter* 的后半部分, 认为这部分是由 *partes* 或 *pretium* (价格) 衍生而来, 这样就符合其“中间人”“中介”和“商务中间人”等含义(参看 Hermann 1956/2002);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译员一词源于梵文。尽管如此, 拉丁文中译员 (*interpretes*) 一词的语义基础恰当, 也符合现在我们对口译的理解, 该词的含义是“释义的人”, 就难以理解的事物对他人“做出解释”。

“做口译”这一动词的词源和“翻译”“做翻译”之间有紧密的语义联系。人们既可以利用“口译”一词的多义性来强调翻译这个概念是以意义而不是词语本身为基础(» 3.2.4), 也可以强调口译在广义的阐释学意义和在狭义的翻译学意义方面的区分。在法律界尤其如此, 律师们视“解释”(法律)为其特权, 并期待法庭译员“翻译”(语言)(» 10.3.2)。跳出语义上的争辩不说, 这一点成为我们理解什么是翻译和/或口译时的巨大挑战, 而本书接下来的章节将致力于寻找合适的答案。

## 1.2 口译的概念

在翻译的概念框架内, 口译与其他形式的翻译活动最明显的不同在于它的**即时性**。从根本上说, 口译是为想要跨越语言和文化障碍进行交际的人们提供“即时即地”的便利。

### 1.2.1 卡德的定义

与许多字典中所显示的义项不同的是, “口译”并不一定等同于“口头翻译”, 或者“以口头形式转达口语信息”。对我们来说, 这样做会把手语(而非口语)的传译(» 1.4.1)排除在口译之外, 还会使接下来将谈到的其他口译表现形式难以被囊括进来。但是, 通过对即时性特点的探讨, 人们可以不必诉诸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而认识到口译同其他翻译形式的不同。早在20世纪60年代, 奥托·卡德(Otto Kade)——一位自

学成才的译员、莱比锡大学的翻译学者(» 2.3.1)——正是从这个角度对口译进行定义,卡德(1968)将口译定义为翻译的一种,在这种活动中:

- 源语语篇只呈现一次,不可重复。
- 目标语语篇在较紧张的时间内产出,几乎没有机会更正和修改。

卡德选择将翻译中的符号实体称为“语篇”(» 7.1),可以替代这一术语的还有“言语”(广义)、“话语行为”或“信息”,视下定义时恰当表达的需要而定。无论用哪一个术语,他的这一定义自然恰当地包含了手语译出、手语译入或手语间的口译,也涵盖了“视译”(» 1.4.2)、“现场字幕配音”甚至网络聊天时的在线(书面)翻译等口译的变体。这就证实了把口译的特征定位为一种**即时性**的翻译活动——在“实时”的情况下为即时使用的目的而进行——的合理性。因此,在卡德所下定义的基础上,为突出译员语篇处理的即时性,而非交际行为的实时性,可以对口译进行如下定义:

口译是翻译的一种类型,它是在源语**一次性表达**的基础上用另一种**语言所做的第一次且最后一次翻译**。

以上两个标准,即源语表达的一次性和目标语产出的即时性,使我们向界定口译概念的目标迈进了一步。但是,当我们把口译这一概念置于翻译这一类属性概念之下,我们在定义这个概念时面临的不确定性变得更大。虽然口译的研究并非要以对翻译所有变体和分支的描述为前提,但是,当我们选择将口译定义为翻译的一种形式后,那就意味着口译研究者不应对其深层的概念问题置之不理。正如乔治·斯坦纳(1975: 252)在谈到德语的“译员”一词时所说:“仔细看来,译员(德语 *Dolmetscher*)所进行的似乎再平常不过的跨语言传译活动隐含了翻译的全部本质和理论”。

### 1.2.2 作为翻译的口译

鉴于翻译理论范畴的广度和丰富程度,如《劳特利奇翻译学百科全

书》和《翻译研究手册》所展示的那样,我们有多种方式来阐释口译是翻译的一种形式。由于不同的学者会根据各自的研究目标、经验和兴趣来界定自己的研究对象,他们对翻译的本质这一基本问题的回答也各不相同。为了厘清选择范围,让我们看看“什么是翻译”这一问题的四种答案,并思考它们的理论含义。

翻译是:

(1) 以一种语言中的口头或书面表达的方式传达另一种语言中同样意义的表达过程。(Rabin 1958)

(2) 把思想从一种语言(源语)向另一种语言(目标语)转换的过程,无论是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是手语方式的语言。(Brislin 1976a)

(3) 产出目标语语篇的复杂系列行为,这种行为与场景相关,以功能为导向,面向另一种文化/语言中的接收者,并以特定的源语语篇为基础。(Salevsky 1993)

(4) 无论以何种依据被认为是以“翻译”的形式呈现或者被认定是“翻译”的话语行为。(Toury 1995)

定义(1)突出了源语和目标语表述的关系,强调“意义的等同”是基本要素。它还通过“意图”和“期待”之类的词含蓄地指涉了主体及主体的态度。定义(2)将翻译描述为一种以“语言”为媒介的“思想”的“转换”过程。定义(3)介绍了一些描写性的特征,例如“场景”“功能”“语篇”和“文化”,强调翻译产品以目标语为导向的理念。以目标语为导向的理念在定义(4)中发挥到了极致,这一定义已经放弃了任何规定性的权威,并把目标语社会中任何被看作翻译的行为都当成翻译。

虽然这四个定义都涵盖了口译,但它们突出的是不同的概念维度。它们所认定的翻译的基本特征(即:转换、思想、等同、意图、文化等概念)将体现在我们对口译的定义中,并在后文的描述和解释过程中进一步阐释。当然,我们也可以对翻译下一个我们自己的定义,但仅仅为了推动口译研究的发展就重复对翻译进行定义,未免多此一举。因此,我们可以使用以上翻译的种种定义作为概念的基本组成部分,如:

- 一种活动，（主要）包含
- 话语（语篇）的产出，它们
- 被认为拥有类似意义和 / 或效果
- 同其他语言和文化中
- 已有的话语类似

这些术语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修改，比如“活动”这一概念就可以具体理解为“服务”，具备“专业”资格的服务，其目的是“帮助交际”，使“客户”和“使用者”受益。同样，在特定的“场景”和“文化”中，我们可以将“产出”（和“交际”）具体化，我们也可以阐释并区分诸如“文化”“语言”“话语”和“意义”等关键概念。术语的精确表达固然重要，同样重要的是，口译的概念框架应反映出我们理论争论的关键方面，包括：

- 译员任务的范围（“主要”是产出）；
- 对翻译过程的想法（以目标语为导向的“产出”，而不是由源语决定的“转换”）；
- 翻译产品的规范性特征（对“意义”及“效果”的“相似性”假设）。

无论你赞成哪种看法，包含以上术语的定义框架应当为口译研究学者提供充分的支持，以便将口译这个研究对象作为翻译的一种形式加以界定。在教科书中这一点应尤为清楚，任何研究对象的定义都有必要同一些理论假设联系在一起。按照吉迪恩·图里（1995: 23）的说法：

确立研究的对象是理论的必要功能之一，也是理论的组成部分。这绝不是一个中立的过程，因为理论总是为满足某种需要服务的。所以，它的建立和检验应与人们想要提出的问题以及处理研究对象可能的方法紧密联系，当然，这样得出的相应答案也被视作可接受的。

在这样一种相对论的视角之下，不可能存在所谓的一成不变的、一

劳永逸的、“真正意义”或“要素”的客观定义。这种“非本质主义的”、后现代的意义观被顶尖的学者认为是翻译学的“共通点”(Chesterman and Arrojo 2000)。其理论和方法的影响力在本书后文的章节中会愈见明显(» 3.3.1)。现在,在理论基础这一章,我们还是回到口译的概念,来检视根据不同标准如何对口译做进一步的细分。

### 1.3 口译的场景和格局

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口译现象的话,最明显的分类和识别标准是口译活动发生的**社会互动场合或者场景**。从属于不同语言和文化团体的人们为了一些特定的目的进行交际,口译活动由此开始。除了这种在不同社会场景间社会实体的交际之外,中介联络在多语言的社会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可以在社会内场景谈论口译。

#### 1.3.1 社会间和社会内场景

最初,在不同语言团体中的某些中介联络是为了“经商”,满足贸易和交换货物的需要,因此,**商务口译**成了“最原始的”口译。早期的文献中谈论过不同类型的口译,亨利·梵胡夫(1962)谈及,**联络口译**是商务谈判中会用到的一种口译形式。30多年后,詹蒂尔等(1996)利用“联络”的普遍性含义暗指“连接”和“联接”,将“联络口译”一词延伸至许多社会间与社会内口译场景。

不同语言和文化团体的代表为了同一目的,即建立和培养政治关系,会依靠中间人进行我们通常所说的**外交口译**。当关系紧张或在他们建立关系前,武装斗争使得在军事场景里协调性的交际变得十分必要,这种**军事口译**,例如友军协商、休战谈判或审讯俘虏,与外交口译有一定的历史渊源。

随着社会日渐综合化和复杂化,我们会想到在多民族的社会政治实体(比如罗马帝国时期或西班牙的黄金时期)中,个人或团体使用不同的语言,这使得译员的服务成为必要。随着执法机构和法律监管部门的建立,尤其是在新征服的土地和殖民地上,为确保操非官方语言者亦无法逃脱罪责,政府征召了译员。于是,**法庭口译**成为社会内部机构背

景下的典型例子，16世纪的西班牙还颁布了特殊的法律条款。在许多法律条款下（司法机构中），通常“法庭口译”的任务包括经过认证的文件翻译以及准司法性的、行政性的听证会。这样人们就将具有更宽泛意义的法律口译或司法口译与审判法庭口译按其特殊的、典型性的场景区分开来。

除了法律领域，译员还使近年来出现的多元种族社会的“多语”交际成为可能，这些国家在平等主义的背景下致力于为所有公民和居民谋“福利”。当语言能力方面的“机会平等”原则成为人们的期待之后，社会内部的口译变得愈加重要。比如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法律为人才市场上的失聪人士提供了平等的机会，这极大地推动了为手语使用者提供的口译服务（» 1.4.1, » 2.1.2）。随着为失聪人士提供雇佣培训和普通教育以帮助他们“回归社会”的不断努力，在教育场景下的手语传译（教育口译）成为社会内部最重要的一种口译形式。

从人才市场到一系列公共机构和社会服务机构，享有权问题是在移民发展的背景下新的交际需求的核心。与此同时，在20世纪60年代瑞典、澳大利亚开始回应社会需求，提供口译服务来帮助新移民在接收地社会正常生活，其他国家也慢慢地开始处理这种社会内的交际需求。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面对公共部门（医院、社会服务机构）的问题时，“社区口译”才逐渐成形，于是社区口译，也称作公共服务口译（主要在英国）成为口译实践的新领域。其中卫生保健口译（医疗口译、医院口译）和法律口译（包括在警察局和庇护所场景等）是机构领域中最重要

的方面。

在社会内的层面上不算突出的口译类型是媒体口译或广播口译（主要集中于电视口译），主要是为了在社会文化团体内部使得外语广播可以为媒体使用者所用。因为媒体口译（多从英语译出）通常包括国际层面的特点和内容，所以媒体口译以一种社会间和社会内的混合形式呈现出来。另一方面，考虑到媒体口译中的手语传译形式，媒体口译的社区维度更加突出。同样，在战争特别法庭上的法庭口译也属于国际层面。

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口译活动涵盖于不同的历史场景之中，从不同部落之间首次见面到不同社会间机构化的“贸易”以及在社会内部（“社区”）的关系。于是我们可以假设一个这样的范畴，从交际的社会之

间扩展到社会内部，反映了机构联系和交往的不断增多。从社会之间到社会内部，有历史依据表明口译作用的一些场景如图 1.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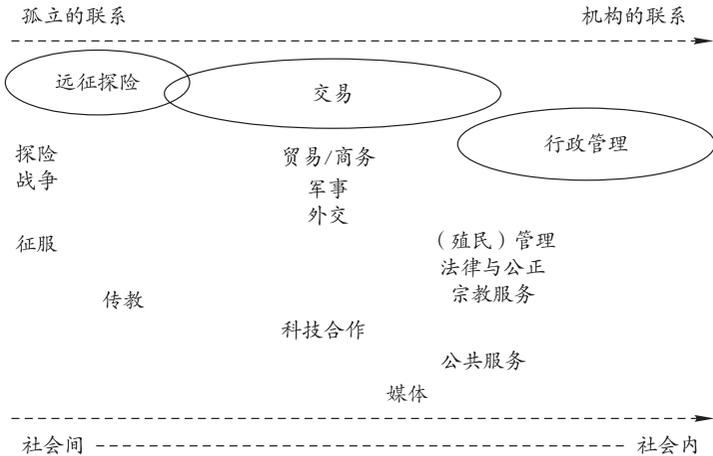


图 1.1 不同社会互动领域中的口译活动

所选场景以“远征探险” (= 孤立的社会间)、“交易” (= 机构化的社会间)、“行政管理” (= 机构化的社会内部) 为标志分组，如从左上角到右下角所示，粗略地显示了口译场景在不同时期相对重要的发展和变革。

### 1.3.2 互动格局

口译类型除了按社会背景和机构场景进行分类以外，另一种很重要的区分方式是按照不同交际互动格局进行分类。在早期的社会学分析中，R. 布鲁斯·W. 安德森 (R. Bruce W. Anderson) (1976/2002) 构建了将口译视为“三方交际”格局的模型 (» 4.3.1)，双语译员在两个 (单语) 客户之间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这通常被称为“对话口译”，突出了面对面沟通交流的模式。即使它与前面介绍过的“联络口译” (« 1.3.1) 不是同义词，二者也有紧密联系。这两个术语都强调沟通的双重性质，区别于由多国家、多机构的代表们参加的会议上的口译，即会议口译。

为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服务的口译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突出的口译表现形式。20 世纪初，当国际联盟所使用的英法两种

官方语言发展成国际会议中使用多种语言时，国际会议传译才成为被人们所广泛接受的特殊行业。国际会议传译在欧盟语言平等的政策下成为典范，并超越多边外交深入到几乎所有领域的活动中，涵盖了超语言的合作与交际。不同的是，会议口译发生在特定的“程式化”交际形式中（“会议”）。会议口译通常在国际环境中进行，但在比利时或加拿大议会等国家机构内也会用到会议口译。

我们结合不同格局（互动安排）的差别和图 1.1 模型中不同“社会（交际）活动层面”的差别，可以看出，口译的概念正从国际的口译向社会内的（社区）口译扩展。虽然将会议口译和社区口译相提并论的做法十分诱人而且易行，但很重要的一点是需要认识到，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关注社会文化的社区层面，还是他们的成员/代表，或是交际的形式（比如是一个多边会议，还是面对面对话）。图 1.2 试图解释这个双重的范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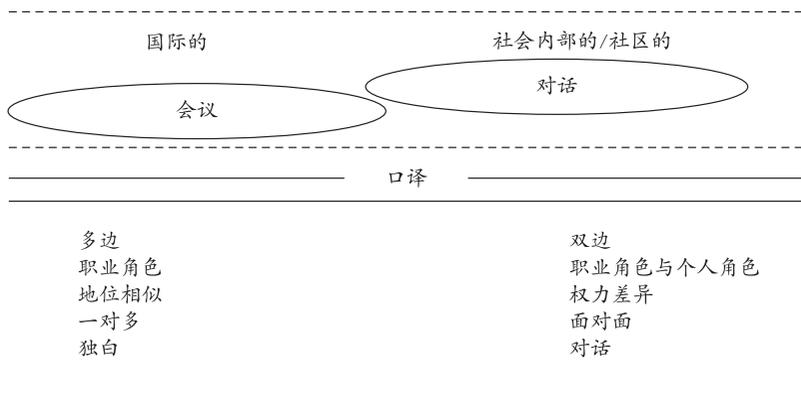


图 1.2 口译的概念范畴

该图的主要思想是上述两个层次允许多种组合，因此国际场景中（例如在两国元首会议上）的对话口译，同样可以被视为社区会议场景中的口译（例如失聪人士参加的大会）。即便如此，图 1.2 底部的描述语也突出了与双重频谱的两端相关联的一般特征或典型特征，即社区中的国际会议口译和对话口译。

虽然这些描写性特征并不详尽，也无法将其区别尽数展示，却也展现了一些重要的不同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记住参与一方是个体的人，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社区口译的本质，他或她代表自己说话和行动。

“国际的与社区的”以及“会议口译与对话口译”的两分法只是区分主要口译(子)类型的一种方式。下面的部分将介绍其他参数和口译类型，旨在加深对研究现象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认识。

## 1.4 口译类型的参数

除了从广义的角度以场景和格局来区分不同的口译类型之外，还有一些明确的标准来区分其他更具系统性的口译类型和子类型，其中包括语言模式、工作方式、方向、技术使用和职业地位。

### 1.4.1 语言模式

在多数涉及这个主题文献当中，“口译”(interpreting)这个术语一般用来表示口头语言的使用，传统上参考西方欧洲语言，用于国际会议和组织。“口语口译”这一术语的意义变得更加明晰，是因为“手语口译”(通常是“为失聪人士提供的口译”)的需求不断增长而带来的变化。因为事实上失聪或有听力障碍的人群依赖于一系列视觉而非听觉媒体的语言符号，所以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手语传译**(或**视觉语口译**)。这里可以区分一下传译中的手语(比如美国手语、英国手语、法语手语等)和其他基于口头和书面语的手语符号(例如英语手语)。前者是指被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失聪人士**群体作为母语使用的一种符号语言，而后者属于第二级(基于口语的)符号系统，被称为**转译**(transliteration)。客户会根据其语言能力和个人喜好来雇用手语译员或者转译者。

译入手语的传译有时被简单地视为“打手语”(“声音到手语的传译”或“手语到手语的传译”)，与此相对的是“说话”或“话语传译”(“手语至说话的传译”)。在与失聪或失明人士的交际中使用了一种特殊模式，需要手语信息(包括**手指拼写**)的人将手放在手语者的手上(**触觉传译**)。

### 1.4.2 工作方式

和语言模式一样，在新的工作方式出现之前，最初的口译方式并不要求有术语规范。直到20世纪20年代，当传输设备的发展让口语译员可以

在源语讲话的同时开展工作时，便有了**交替传译**（在源语之后表达）和**同声传译**（在源语表达的过程中表达）。有意思的是，同声传译最初称为“**同声交替传译**”，也就是对两种或多种语言交替翻译的同时传译。最近，随着便携式数码记录器和录音重放装置的使用，口译有了使用相同标签的另一个混合形式。在这种现代形式的同声交替传译（或同交传）中，译员通过回放并同步口译源语发言的数字化录音（» 11.1.2）来产出连续翻译。

由于交替传译未设定源语语篇的长度，我们可以认为，交替传译既可指“一口气”翻译，短到一个词，也可以指对长至一整篇或其较长部分的处理（图 1.3）。鉴于不同译员的工作方式、记忆技巧和一系列情景变量（例如幻灯片演讲）的不同，长篇的交替传译通常需要**笔记**，这也是在 20 世纪早期会议译员形成的习惯（» 2.1.1）。因此，使用系统笔记的交替传译往往被看作“**经典**”交替传译，与不需要笔记的**短交传**相区别。短交传则往往暗含了在对话口译格局中的双向工作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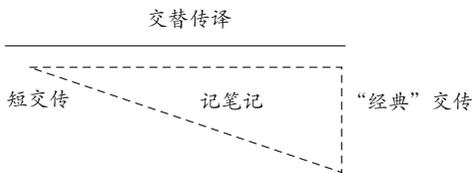


图 1.3 交替传译的连续统一体

对于手语译员来说，在视觉方式上的表现使他们没有办法进行额外的视觉注意，也没有办法做笔记，他们以短暂交替，尤其是同时的方式工作。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背景下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的区别并不明显。因为在听觉渠道中无论是画外音还是手语插入，手语译员都可以选择在目标语信息结束前开始产出。即使是口语的联络员，也更倾向于同时产出（实质上是交替的形式）。

然而，由于不存在源语和目标语声音上的重叠，同传成为手语译员的工作方式（不需要声音传输设备），而以同声方式工作的口语译员则需要使用电子听觉传输设备。只有当译员在一个人旁边或者只有几个听众的时候才能做**耳语口译**或“**咬耳朵**”（法语是 *chuchotage*），实际上并不是真的在咬耳朵，而是在压低声音（*sotto voce*）讲话。这种方式在有可移动传输设

备时也是可行的(麦克风和耳机接收器),就像在参观介绍时用的那样。然而,设备齐全的同声传译(» 11.1.1)在今天已经广泛使用,“同声传译”(简称“同传”/SI)一词是指“在隔音的同传厢中使用同传设备做口语口译”。

同声传译的另一个特殊形式是“看着”书面文本进行口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视阅翻译”(sight translation)。它是同声传译的一种形式,在向观众做实时口译时,更准确地应称为“视译(sight interpreting)”。视译时,译员的目标语产出并不与源语语篇的表达同时进行,而是与译员实时(视觉)接收的目标语文本同步。如果译员“看着”书面文本工作并不是在为(大量)听众服务的实时环境中,那么视译就变成了交替传译的方式,或者类似于“口头笔译”的口译,有很多机会来“检查”和修改。(口语)同声传译的一种特殊方式是在同传厢中有稿同传。由于源语仍然是通过声道传达,加之许多演讲者脱稿讲话或者为节约时间进行省略,这种同声的口译模式不应归为视译,而是一种包含视译成分且形式较复杂的同声传译。

图 1.4 中描绘的此类区别,与言语方式并不完全对应。正如上文提到的,打手语(声音到手语、手语到手语或者文本到手语的口译)在没有特殊设备的同声模式下是可行的;手语到声音的口译在有或没有麦克风和同传厢的情况下都可以进行。只有当独白型的手语源语需被译成几种(口语)语言时,才需要使用同传设备将其分成多个独立频道。从文本到手语传译时,译员可能需要在接收(读取)和产出(打手语)之间交替,使手语传译更接近于(短暂)的交替传译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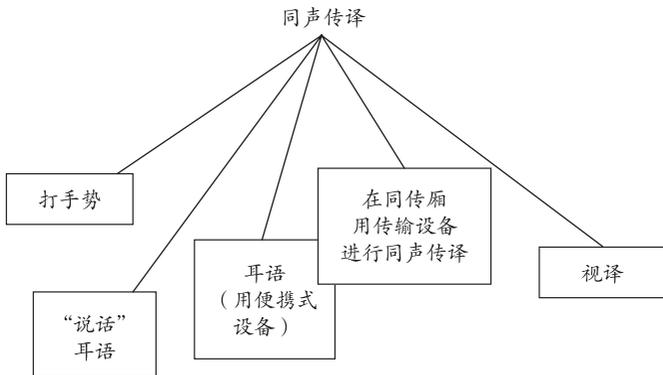


图 1.4 同声传译的形式

### 1.4.3 方向性

口译过程总是单向进行的,即从源语到目标语。在交际活动中,方向问题更为复杂。在面面对话中(« 1.3.2, » 4.3.1),译员会双向工作,即“来回”用两种语言口译,取决于交际双方的话轮转换。双边口译通常与“联络口译”和“对话口译”相关联,但它在会议交际中也可能发生。此时译员在一个“双语同传厢”中工作,或者说在进行“回译”(将听众的问题和评论译回发言人使用的语言)。

虽然“单向”口译在会议口译中经常发生,但在交际活动中却没有属于它的特殊标识。相关的区别还和译员不同的工作语言组合有关,这些工作语言被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AIIC)(» 2.1.1)分类为A语、B语或C语(A=母语或非常“主动”的语言;B=近似于母语能力的“主动”语言;C=能够“完全理解”的“被动”语言)。西方会议口译的传统偏好同声传译,从B语或C语译入译员的A语。“A到B口译”或“回转口译(**retour interpreting**)”虽然广泛地在市场上使用,但却没有像同声传译一样为国际组织所接受。相反,手语译员(其中许多都是非母语手语译员)却参与A到B语和B到A语,即手语到声音口译这样一个更具挑战性的方向当中。

还有一点也可以成为口译分类的一个参数,它与口译的方向性有关,那就是在具体的交际活动中源语向目标语转换的直接性。当译员的语言组合不足以做“直接口译”时,就要依靠“接力口译”,即通过第三种语言的间接口译:两个(或多个)译员的工作联系在一起,其中一个译员的产出就是另一个译员的源语。以同声的方式进行接力口译是东欧国家的通常习惯,其中俄语在多语种的苏联是中心语言。苏联的接力体系及其对A到B的标准方向性模式的依赖,一直为西欧模式的支持者所反对。但是在联合国和欧盟的工作语言中,A到B语的组合与接力口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常将英语作为中心语言。随着欧盟的不断壮大,接力口译变得十分重要。

### 1.4.4 科技的应用

技术的应用在前文论及同声传译时探讨过(« 1.4.2),其主要功

能是避免源语和目标语在音响声道中的混合。然而,显而易见,声音和图像的电子传输系统更普遍的作用是克服空间距离,“连接”讲话者(包括译员)和不在“听力所及范围内”的听众,或在手语传译中不在视觉范围内的受众。除了在现场(例如在会议厅里)的一般应用,电子音像和视觉传输设备也会特别用以连接指定地点之外更远的场所。在通常所称的**远程口译**(» 11.2)中,译员同演讲者和听众不在同一空间。这意味着译员的工作空间是通过计算机系统连接的同传厢或独立场所。通常工作场所之间的距离会更远,但都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远程通信设备进行连接。

在20世纪50年代,远程口译的古老形式是**电话口译(通过电话的口译)**,而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运用音像和视觉传输的远程口译才开始广泛使用,尤其是在社会内场景中(医疗机构、警察局等等)。电话口译通常采用双向连续模式的标准电信交际设备进行。视频电话的出现对失聪和听障的人士有重大意义,现在他们在许多国家都能够获得视频会议服务——**视频接力口译服务(VRS)**。视频接力口译服务使失聪人士能够通过电话用手语交流,由“视频译员”传达。

除了电话之外,使用视频会议技术的远程口译可以服务于国际和多边会议以及社区机构间的接洽。几十年前在国际会议设施中开创了卫星连接,远程口译最近在基于社区的领域,如医疗卫生和法律环境内尤为突出。这包括涉及失聪人士的场合,有时被赋予一个特有的名称“**视频远程口译(VRI)**”。

该领域的术语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断演变。远程口译与**视频会议口译**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前者译员与口译活动参与者身处异地,而后者译员与参与“**视频连接**”的某一方在同一地点。

面向未来的和科技驱动的远程口译形式(尽管存在对口译“去人性化”的批评,远程口译其实还是依赖具有特殊技能的人),是以机器翻译软件和语音识别与合成技术为基础,致力于开发**自动口译系统**。虽然这种**机器口译**(» 11.3.2)在近期不太可能提供“全自动高质量的口译”,但移动技术和云计算的进步促使“从语音到语音的翻译”在某些应用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

#### 1.4.5 专业地位

尽管目前所介绍的各项参数和口译类型与口译活动的进行方式相关,但是另外一个重要的特点则与口译人员的技术和专业水平相关。很多关于口译的文献常常预设口译活动和口译工作者处在某种(通常是很高的)专业地位上。也就是说,一般的“口译”二字通常意味着**专业口译(或职业口译)**,而“译员”则被认为是具有特殊技能的“专业人员”——本书提到“译员”的时候也是如此。从历史的观点看,当然,要清晰地区分**专业口译与非职业口译或自然口译**(即未经过特殊培训的双语者所做的口译)是很困难的。

“自然翻译”的话题从20世纪70年代起由加拿大翻译学家布莱恩·哈里斯提出。哈里斯提出“翻译与双语现象共存”的假设,即所有的双语者都至少有一些翻译的能力(Harris and Sherwood 1978: 155)。同样,图里(1995)提出了一个相对温和的观点,即“天生的译者”,他强调双语能力的作用在于其为学习如何口译(和笔译)奠定了基础。这两种观点都指出一个没有经过特殊培训的双语者在习得和应用口译技能的学习过程中所具备的优势。哈里斯和图里都认同确实存在社会文化翻译规范,它促成了口译实践也决定了口译活动所需要的技能水平的高低。

“没有经过特殊培训的人在从事着日常的翻译工作”(Harris and Sherwood 1978: 155),自古以来这大概都是普遍现象,现在也是如此。说不同语言的人相互沟通时常常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译员的帮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社区的口译场景里移民或失聪父母的孩子若具有双语能力,就会担任其家庭的译员角色。总的来说,只有当口译任务的需求超出了“一般”双语者的能力时,人们才会把口译工作交付给具备特殊知识(相关的文化或者相关主题)、技能(记忆、笔记或同声传译技能)及其他能力(如道德品质)和可信赖性的人(» 10.2.1)。尽管如此,决定是否专业(口译)的标准并不总是硬性规定的,而口译及译员的专业地位应置于其产生的社会文化及体制背景下来考察(» 2.1)。

### 1.5 口译研究的领域和维度

本章所介绍的各种类型特点展示了口译作为一个研究客体的多面特

性。本部分的小结将通过梳理一系列与口译实践主要领域相关的概念维度和参数,来展示口译作为一个研究客体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由此产生的口译研究领域的“地图”应能够为本领域的全貌提供一些实用的指引。

在绘制本学科领域里翻译活动研究的版图方面最富盛名和最具影响力的一次尝试,是詹姆斯·S. 霍姆斯(1972/2000)对翻译研究的考察,以一种地理学的方式呈现翻译学研究的“地图”(参看 Toury 1995: 10, Munday 2001: 10)。霍姆斯不太关注口译,他在其分支结构的下方将口译定位为“媒介受限的”理论领域中的一种口头的(相对于书面的)人的(相对于机器)翻译。为了使口译在地图上更明显,海德玛丽·塞拉夫斯基(Heidemarie Salevsky)(1993)为口译研究这门学科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分支结构,其理论子领域是基于一系列情境变量的(参看 Salevsky 1993: 154):口译的变量(交替传译与同声传译);中介的变量(人、机器、计算机辅助口译);语言组合的变量;文化组合的变量;区域/体制的变量(法庭口译、传媒口译等等);文本关系的变量(文本类型、专业程度等等);伙伴关系的变量(源语文本产出者与目标语文本的接收者)。

在以上对 1.3 和 1.4 小节的综合勾画和探讨时,我们可以从以下八个维度勾勒出口译研究的理论领域:(1) 媒介;(2) 场景;(3) 方式;(4) 语言(文化);(5) 语篇;(6) 参与者;(7) 译员;以及(8) 问题。图 1.5 体现了这些概念维度,以阐释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中所涉及的更广范围。

图 1.5 最初的设计是为了体现口译在水平层面的多种维度,对这些维度的垂直梳理则是提出口译实践和研究的主要子领域。图的左边列出了在国际会议传译领域的基础上各种维度的特点。右边垂直的横截面列出了社区口译的主要特点。由于口译现象的多样性涉及方方面面,这个图并不是所有特点的汇总。但总的来说,图表中前七个维度的相互影响凸显了典型领域的关键方面。图 1.5 底部最后一行虚线标注的是基于问题的维度。这里不是描写性特点的统一体,而是迄今为止主要研究问题的一系列例子,我们将在本书的第二部分进一步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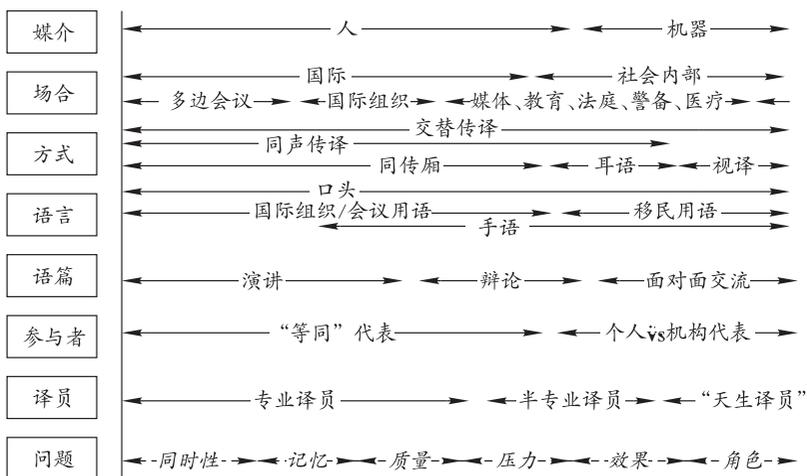


图 1.5 口译理论的领域和维度



### 小结

本章为口译研究奠定了概念上的基础，因为它对口译研究的对象下了定义，并对其不同的类型做了综述。对翻译的类属概念进行研究的理论路径是口译的基础，因此口译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种直接的翻译行为，能够帮助人们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进行交际。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进行解释的行为，而口译作为翻译的一种形式，是对源语话语进行一次性的阐释与表达，它的概念根据不同的社会情境、不同的机构设置（社会团体之间还是团体内部）、情景格局以及互动方式（多边会议还是面对面对话）而具有不同的具体阐述。除了介绍国际会议传译与社区会话口译（包括法庭或法律口译和医疗口译）在典型领域上的统一性之外，我们还基于一系列参数，对口译行为进行了更为具体的分类。这些参数包括：语言形式（手语传译还是口语口译）、工作方式（交替传译还是同声传译）、方向性（双向、B/C 到 A、A 到 B 还是接力口译）、技术应用（远

程口译还是机器口译)和专业水准(自然口译还是职业口译)。最后,我们为口译研究的理论领域描绘了一幅图,从概念上来理解“领域”与“维度”之间复杂的关系。

## 文献来源及深入阅读

英语及其他语言中的“译员”和“口译”,请参看米德(Mead 1999)和波赫哈克(Pöchhacker 2010a, 2015)的口译。还有一些出版物也专门讲述了口译概念的综合分析。哈里斯(Harris)于20世纪90年代首次提出的口译“分类研究”至今仍未出版。关于社区口译类型的讨论,参看詹蒂尔等(Gentile et al. 1996)和罗伯茨(Roberts 1997)的论文。就参考文献而言,参看波赫哈克(2015)“模式”和“场景”标题下的文章。为更好地理解职业口译的不同领域,此处推荐的大部分书目都是集中讨论某一具体类型的口译。这些包括:艾赫贝尔(Herbert 1952)、塞莱斯科维奇(Seleskovitch 1978a)、琼斯(Jones 1998)的会议口译;冈萨雷斯等(González et al. 2012)、赖斯特和泰勒(Laster and Taylor 1994)的法庭口译;黑尔(Hale 2007)的社区口译,和弗立希伯格(Frishberg 1990)、斯图尔特等(Stewart et al. 1998)的手语传译。在《劳特利奇口译手册》(*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Interpreting*) (Mikkelsen and Jourdenais 2015)中可以找到“会议口译”“法庭口译”“医疗口译”“手语传译”等章节。

## 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 ……> 在其他语言中,“译员(interpreter)”和“口译(interpreting)”的词源及其现在的含义是什么?
- ……> 在其他语言中,在字典、学术写作和在专业领域中,“笔译(translation)”和“口译(interpreting)”是如何区分的?

- ……> 在其他语言中，“interpreting”或“interpretation”这两者是否在翻译的层面和注解的层面上有词法的区别？
- ……> 在本国语言和外国语言的不同语境下，哪些形式或类别的口译被认为是最典型的？他们有何区别，有何关联？